

汉字意象、算法与叙事*

周北南

(湖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汉字是一个公共意象,是先民集体意识的物化成象。因此,汉字意象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其本质未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汉字有明确的成象、结字、聚族等算法。汉字成象算法相当于传统六书理论;汉字结字算法相当于汉字结构方式,包括先民认知、模拟客观事物关系而生成汉字的程序性安排和意象之意的概念化过程;汉字聚族算法是先民模拟客观世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法则而聚集汉字的类型化安排,其典型算法是字族理论。汉字能够通过算法叙述汉字成象、结字、聚族等事件。意象叙事是用汉字意象表达先民认知成象的故事;结构叙事是汉字字形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朴素地表达了先民习惯性根据客观事物关系创设文字结构形状的故事;字族叙事主要由一个声符意象串起来的一组汉字用共同含有的底层意义表达涉及字词关系的故事。

关键词:初文;结构;概念化;字族

中图分类号: H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34(2026)03-0085-09

甲骨文以下,汉字形音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方面影响了先秦以来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为了准确解读这些经典文献,古代民间逐步形成以研究汉字形音义为主的传统语文学,后又称作传统“小学”。传统“小学”主要研究文献中汉字的形音义问题,探究汉字形音义的由来、汉字演变的过程和特点、汉字记录的词义变化理据等,其研究细致入微、成果丰富,为当今汉字研究的百花齐放打下了坚实基础。传统“小学”之所以以汉字研究为中心,有两个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读者:一是历史汉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多维属性和特点。

越来越多的历史汉字堆积问题主要源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越来越多,再加上科技不断进步,汉字需要研究的领域确实在扩大,所以,无论是古汉字领域、近代汉字领域,还是现代汉字领域都有新的研究问题不断出现。古汉字材料习惯上包括殷商文字材料、西周春秋文字材料、六国文字材料和秦系文字材料等,这些材料自古以来就吸引了大批学者为之展开长期深入研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因为历史久远,研究难度大,如殷商甲骨文中还有很多字形需要识别,金文中亦有大量异体字、通假字需要识别。近代汉字材料更加丰富,主要包括秦汉时期的简帛、秦汉到民国时期的石刻、秦汉到明清时期的写本、宋代以来雕版印刷的刻本古书四大类。“简帛、碑刻、写本三类文字材料一

* 收稿日期:2026-02-09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浙北大运河诗路文化教育普及现状的调查研究”(KYR18253);湖州师范大学教改课题“元宇宙视域下汉字教学改革研究”(JY18136)。

作者简介:周北南,博士,副教授,从事汉语汉字教学和研究。

般由当时人写定后,未经后人改动,所以最真切地反映了书写时代的文字面貌,对于近代汉字研究而言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而刻本文字资料虽然数量最为庞大,情况却比较复杂:写本时代的文献在进入刻本时代后,其字形和用字往往随着刊刻时代的先后在不断地规范化和当代化,时代较早的宋刻本还较多地保留了写本时代的文字特征,时代较晚的刻本则往往离手写文字面貌越来越远。”^{[1]208-230} 现代汉字一般指“五四”以来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因为简化和规范化的要求,现代汉字也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之后,汉字数字化、智能化等又对汉字研究提出新要求,不断扩大了汉字研究领域和范畴。

汉字的多维属性指汉字涵盖初文、字形、字音、字义和字族等多个维度的研究范畴,每个维度都有自己的汉字特点。如古汉字有形音义关系密切、结构方式简明的特点;近代汉字有形体丰富多样、变化层出不穷的特点;现代汉字有简化、规范化和智能化的特点,故需要从各自属性角度加大研究力度。针对汉字的的多维研究属性和特点,既要做好微观基础层面的考证梳理工作,又要做好宏观历史层面的理论总结提炼工作,努力把汉字本体研究推向更高点。但汉字研究也要避免陷入材料整理和字词考证的泥淖,虽然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汉字学基础理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汉字学的理论体系仍有待完善^{[2]450-473}。

当前,汉字研究又融入了人工智能视角。一个汉字就像一个意象模块,一个汉字的成象结字聚族方式则相当于汉字算法。反之,汉字算法又为汉字本体叙事研究提供了工具和基础理论。

一、汉字是公共意象

意与象的关系论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3]163} 该书记录了圣人认知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先洞见天下事物之精微和深奥,再抽象、模拟成为“象”,定格并表达天下事物。又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3]163},强调“书、言、意”之间的非同一性,于是试图用“象”弥补“书”写意、“言”达意的天然不足与缺陷,阐明“象其物宜”“以形写意”的重要性。

西汉多位学者记载了“四象”造字法,认为汉字之“象”有四个来源: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4]1575} 东汉许慎进一步区分了文和字,提出文源于物象、字生于言语的卓越观点。《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5]314}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许慎提出先民创造汉字的“六书”理论,深刻阐释了文字的生成方式、文字与意义可能存在直接关系。认为汉字之“象”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结果,正如西汉扬雄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6]126};汉字之“象”还要明确达意,能够“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314}“比类合谊,以见指撝”^{[5]314},最终达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5]314}的大道至简的造字境界。许慎的研究表明,汉字之“象”不只是造字的手段,也是先民认知世界、抽象世界的成果。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主张“象形为本”,象形字可以“正生”“侧生”“兼生”新字^{[7]233-234},即象形字是汉字孳乳发展的基础,汉字之象贯穿于整个汉字体系之中,永久保留了汉字“察而可识”的特性。

南宋戴侗《六书故》主张通过分析古文字形体来探求字的本义,以积极践行“以象索意”^{[8]155-159}

的研究方法。全书归纳出188个“文”及45个“疑文”,以及由“文”滋生的245个“字”,构建了“父以联子,子以联孙”的文字孳乳系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核心观点是文字起源于象形,如日、月、山、龙等字直接模仿物形,强调一字必须兼备义、形、声三要素,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依据^{[9]48-52}。在段氏对具体字词的注解中,处处都表现出“象”如何承载和关联“意”的精微考证,实证了汉字“意象关系”“意象网络”的客观存在,如对“考”“老”等字关系的阐释,揭示了字形演变中“意”的延续与“象”的调整等发展规律。段氏注“词”曰:“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凡许之说字义,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说声,皆言外也。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10]434}这里明确梳理出形和意、言三者之间的层次关系,且指出形是言与意的具象化符号。段氏甚至认为古代画图与文字本质相同,但尚未完全等同于文字,也未能成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八卦虽具有指示和会意特征,但因未与特定语音结合,仍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现代学者用现代方法讨论了汉字的意和象的关系。王作新认为汉字意象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意象,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觉形象;它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本源基础是客观外物,而结果则是如“格式塔”心理学所言,经知觉进行积极组织、建构的“形”(或“象”)^{[11]45-50}。他认为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意象性质;因而,明确界定汉字意象是人类积极认知客观外物的结果。即汉字的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及其理解、抽象出来的客观世界内容,汉字之象的创造不仅来源于语词及其表达的概念,还可能直接描摹客观事物之象、对应记录语词的结果,揭示了汉字意与象的密切关联。

汉字更是一个公共意象,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创造成果。战国荀子说喜欢文字的人很多,其中仓颉因为用心更加专一、贡献可能更多而闻于后世,如《荀子·解蔽篇》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12]401}许慎认为仓颉是“黄帝史官”,长期从事文字使用和整理工作,对文字的理解和研究更深刻一些。《说文解字·叙》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5]314}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有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13]1239}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自然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前人见解说明,仓颉只是文字发明、整理和使用的代表人物,文字的创造则是人民大众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的成果。现代以来,鲁迅、郭沫若等明确认为文字是长期的集体创造之产物。鲁迅《门外文谈》:“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14]90-91}郭沫若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从图画、刻画符号逐渐演变而来,经专人如巫史等加工规范而成系统^{[15]1-15}。当代文字学、考古学领域研究成果亦共同认为,汉字是汉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集体创造出来的,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仓颉造字的传说,是将人民群众的创造集中体现在一个代表人物身上的具象化故事。事实上,汉字是先民集体创造、专人系统整理、规范使用的公共意象。

汉字是人民大众都能理解的具有稳定性的意象。它不像文学意象那样个性化,属于作者个人所有,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汉字意象是由意而象的集中创造,揭示了人民大众先有社会共识、后有汉字形象的生产过程。汉字阅读者大多时候只需要继承它所表达的人民大众的共同认知就能完成取义,即达到理解汉字的目的。而文学意象则是由象而意的个人创作,体现了作者用语言之象艺术地表达个人之意的塑造过程;同时,需要读者的接受和重新创造才能既建构读者个人心中的意

象,又满足个体阅读和审美需求。因此,汉字意象的稳定性,既根源于人民大众的共同认知和约定俗成,也根源于社会协作的文化基础。汉字意象的稳定性还源于汉字系统内部已经高度网络化的约束机制,及其创造的察而可识的视觉形象。

二、汉字有成象结字聚族等算法

汉字算法借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概念,用来概括汉字成象结字聚族方式。汉字成象方式是汉字符号成形定格的方式,相当于人们一直讨论的造字方法;汉字结字方式主要指用来结字的多个汉字构件意象之间的各种组合关系,如并列关系、层叠关系等,相当于传统所说的汉字结构方式;汉字聚族方式主要指一组汉字意象具有同源代际关系,如人们常说的在同一声旁聚合而成的字族内部各字存在同源代际关系。前人往往将汉字造字方法和汉字结构理论一起讨论,忽视了汉字结构方式蕴含的客观物象关系。前人又主要围绕形声字声旁讨论字族成员的同源代际关系,形成汉字“字族”理论,却忽视了形声字形旁也有聚集意义。

汉字结构理论大体发端于许慎的六书理论,发展于戴震的“体用”说,繁盛于现代多种“三书说”,细分于当代构形学之结构类型观。汉字结构理论主要强调一个汉字的整体观感。臧克和认为:“汉字的认知特征,是结构整体性感知。就功能层次而言,汉字形体标记区别音义,是基于结构整体的规定。结构成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离开了结构整体联系,部件成分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1]42-48}即汉字结构的整体性形成汉字的区别特征。但汉字结构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汉字结构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关系和中国先民创造汉字的基本模式。

从意象之象来看,汉字结字方式应该是先民认知、模拟客观事物关系而生成汉字结构的程序性安排。它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单个意象类、左右并列意象类、上下层叠意象类和外内包含意象类。单个意象类一般是由一个意象(含指事符号)独立成字,其中,单纯一个意象成字如日、月、山、水、人、口、手、木、火、土、田等,含指事符号的汉字意象如上、下、本、刃等;左右并列意象类一般由两个以上的意象左右并列成字,其中同一个汉字意象重复并列的字如从、林、双、朋、非、羽、弱等,两个以上不同汉字意象并列的字如明、确、河、流、好、坏、晴等;上下层叠意象类一般是由上下两个以上汉字意象上下层叠成字,其中,同一个汉字意象重复层叠的字如二、圭、多、爻、吕、炎、昌等,两个以上不同汉字意象上下层叠的字如思、想、花、朵、安、定、章等;外内包含意象类一般是由外部和内部两个意象相互包含成字,其中,全包含类字如国、困等,三面包围类字如问、风、凶、幽、区、医等,两面包围类字如房、尾、这、起、司、可等。每个大类里面还可以分为多个小类,如外内包含类可以细分为全包含类、三面包围类和两面包围类等。有些难以分别结字关系的字如坐、乘、爽、巫、噩等,则可从广义上归为某一大类,目的是通过研究一个汉字内部各个构件意象的组合关系,推断先民认知、模拟客观事物之后汉字意象结构的程序性安排。

从意象之意来看,汉字结字方式体现了意象之义的概念化过程,而非机械地记录汉语语词的意义。单个意象类的意义概念化是先民集体认知、概括和抽象客观事物的过程,如“日”之意是先民集体认知、概括和抽象天上太阳内涵形成的概念;多个意象组合成字的过程则更加明确地呈现了先民集体认知、概括和抽象客观事物的路径和方式,是先民更加理性地将多个意象之意集中概念化反映,

如“浅”之意是先民集中、概括“冫”和“戈”两个意象之意的结果,同时又不自觉地区分了“浅”字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即“冫”指“浅”的概念外延,“戈”则按照“右文说”可以指代“浅”的概念内涵。从单个意象之意概念化到多个意象之意集中概念化,是先民认知方式的一次质变,也是汉字超越其他象形文字的关键升华,还揭示了汉字领先人类其他文明的古代象形文字的根本原因。汉字多个意象之意的集中概念化,源于传统六书的“象形”,萌芽于“指事”,发展于“会意”,质变于“形声”。汉字六书理论的精准概括体现了先民的朴素概念化智慧。

总之,汉字结字方式是意象之意概念化和意象之象程序化的整合过程,它既塑造了汉字的方块性特征,也体现了先民的精心创造过程,展示了先民用意象表达及认知客观事物关系的智慧。如果把一个汉字意象看作一个人工智能模块,那么,一个意象模块的生成方式和多个意象模块的组合方式就相当于人工智能算法,其规定了汉字意象模块的生成、发展和演变路径,但又未改变汉字结构和方块形态的稳定性,这就为汉字能够长期流传和充满活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制性能量。汉字结字方式简约地揭示了先民创造汉字的哲学思想。

汉字字族理论大体萌芽于汉代“声训”,发展于宋代王子韶等人的“右文说”,奠基于清代的“因声求义”和系统系联法,深化于沈兼士对“右文说”进行全面学术史梳理与理论提升,总结于王力的《同源字典》及其确立的同源词三原则:“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作同源字。”^[13]由此可知,汉字字族理论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字声字音的研究,间接实证了字词关系的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特点。“但是文字毕竟不是语言的要素,字族只是文字符号的聚合。文字的衍生与词的分化有时是同步的,字族相同,词源也相同,但有时又是不同步的,字族相同,词源不一定相同。”^{[1]124-129}

汉字聚族方式确实基于一个字族全部成员的同源代际关系,即一个汉字字族的成形至少具备两个特征:字族成员意象的同源性和代际孳乳的衍生性。不过,同源代际关系的讨论不应该局限于汉字音声方面,还需要关注公共意象本身的意义,关注人类的认知成象模式。即把汉字形旁看作同源意象,考察由其衍生的相关汉字代际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字族概念的外延。据此,汉字聚族方式又大体分为三大类:侧重于概念外延的形旁聚族类、侧重于概念内涵的声旁聚族类和形声聚族类。形旁聚族类主要是以一个形旁意象作为一组汉字的共同源头所形成的集合,如鸡、鸣、鸥、鹊、鹭、鸯、鸯等都含有形旁“鸟”字,花、蕊、苏、苗、营、落等都含有形旁“艹”字,它们共同反映了先民划分客观事物类别的朴素模式;声旁聚族类即传统意义上的字族范畴,是以一个声符意象作为一组汉字的共同源头所形成的集合,如钱、浅、线、贱等都含有“戈”字,清、情、晴、睛等都含有“青”字,它们反映了先民认知、表达客观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所习用的基本语言模式。形声聚族类指一个意象既能以形旁身份、又能以声旁身份聚合一组汉字,进而形成形旁或声旁字族,如意象“衣”在衫、袖等字中作形旁,在依、哀中作声旁,意象“力”在功、劳、助、劲等字中作形旁,在勒、肋等字中作声旁,但这类汉字很少。如果说汉字结字方式打破了拼音文字的线性组合特点,那么,汉字聚族方式则创造了汉字之间的紧密联系性和强大系统性,保证了汉字特有的历史稳定性。

既能作形旁又能作声旁的汉字意象虽少,却是汉字体系中的“核心意象”,如“木”既是枝、杆等字的形旁,又是沐字的声旁。这类“核心意象”不仅是同源字、词研究的关键,能够帮助追溯字族内部各字的形义联系以及相应词族内部各词的音义联系,也打破了“形旁只表意,声旁只表音”的简单二分法,揭开了早期形声字声旁亦多起源于表意意象的历史面纱;通过形声相益的方式,创造出具有条

理性和稳定性的汉字系统。汉字核心意象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汉字“形、音、义”三者紧密合作、协同演化的共同体关系。

汉字聚族方式是先民认知、模拟客观世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一自然法则的结果。他们依据此法则创造和聚集汉字,形成了汉字的类型化安排。一个意象聚集而来的字族就是一个汉字类型、一种认知模型,不仅有利于人们养成习惯性的汉字阅读思维,还能进一步生成汉字算法,提升汉字汉语系统活力。

三、汉字能用算法叙事


汉字叙事主要指汉字初文、字形和字族等作为叙事主体叙述汉字成字成词的故事,也就是运用上文所论述的汉字算法叙述汉字成字成词的故事。汉字叙事应以叙述先民的认知成象、汉字结字聚族等本体问题为基础,进而为考古学、史学、文学、传播学及哲学等相关学科提供叙事支撑——这些学科常需借助汉字叙事来辅助其研究。

在1936年4月给沈兼士的回信中,陈寅恪评价其关于“鬼”字的研究时明确写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202}这不仅是对沈氏论文的赞许,更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基于字词角度的观察历史的研究路径。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多年之后提出:“一个词语用一个字形来表記。万象便蕴含在各个字当中。万象在词语中被概念化,通过字被定型化。”^{[20]17}汉字早期形态如甲骨文、金文等均蕴含着先民的生活经验、宗教仪式与社会结构,每个字都是一个“文化叙事单元”。汉字不单是记录语词的符号,其构形如象形、会意等直接展示了古代中国的祭祀、战争、农耕等场景,形成了一种“视觉叙事”。如“王”字源于斧钺之形,隐喻权力与征伐;“祭”字展现手持肉献于神前的仪式。美国学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中说道,汉字通过具象组合直接表达事物关系,挑战了西方语言的抽象逻辑与线性叙事传统;汉字是“动作与过程的速写”^{[21]156-177},如“信”由“人”与“言”构成,呈现“人言为信”的意象叙事,这种空间化的表意方式更接近诗歌的本质。二十世纪初,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受此启发创立意象派诗歌,提出汉字比字母文字更有“视觉叙事的经济性”特征之观点^{[22]82-91}。总之,古今中外学者共同认为汉字不仅可以叙事,还能够经济性叙事。


从清代朴学到现代学者如陈寅恪、裘锡圭等,都认为可以根据字形演变考察历史叙事的变化,追寻社会变迁的轨迹。譬如,汉字形态的流变如篆、隶、楷的演进,可能暗含政治、文化权力的转移;不同时期的文字规范标准又是国家叙事的体现,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是通过标准化小篆达到巩固帝国中心地位的政治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简体字改革运动则承载了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赵元任亦指出汉字具有“超方言”特性,其使不同口语群体共享同一书面叙事传统^{[23]58-60}。改革开放后,汉字叙事研究进一步加强。董乃斌具体阐述了“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24]169-177}。朱崇才认为“汉字通过其构形,叙说一个事件”,提出了“汉字叙事学”,希望用“汉字叙事”这一核心概念,来概括象形、象事、指事、会意等诸多下属概念,从而将汉字的“叙事”上升为汉字系统中的一个“范畴”^{[25]74-82}。更有现代学者提出汉字结字聚族方式是一种规则性叙事^{[26]67-73},如左偏旁“讠”在字形方块中所占面积比例虽比声旁小得多,但其位置固定,有利于读者形成习惯性认知,故凡“讠”偏旁都表示该偏旁字义的范畴,读者只需投入较少认

知即可“认半边字”理解字义,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固定位置叙事。左右结构中表示字义外延类偏旁如“氵”还符合线形语言序列中外延一般在内涵前面的次序安排,如此确实可以节省读者的认知精力。左偏旁“氵”聚集起来的字族成员还可以集体叙事,如江、河、湖、海等表达了水的不同形态,清、浊、淡等表达了水的质量,池、沟、渠等表达了水体特点,泪、泣、汗等表达了人体生理现象等,这些语义类型正好体现了汉字的文化叙事特点。

从古至今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汉字叙事早已被多维度关注,从关注汉字叙事的其他学科转向关注汉字本体叙事,进而将汉字叙事纳入汉字学领域进行研究,由此拓展了汉字学的研究范围。但真正的汉字本体叙事研究应该才刚刚起步,它也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下文尝试从意象叙事、结构叙事和聚族叙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其一,意象叙事是汉字以其形状结构朴素地表达了先民认知成象的故事。王继洪根据“昔”的甲骨文等,想象古文“昔”字形应该由上下两部分构成:“或者上部是波浪的象形符号,下部是太阳的象形符号,或者下面为波浪的象形符号,上部是太阳的象形符号。”进而猜想“在上古时期,先民曾经受过洪水的考验”,并验证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27]92-108}。这一猜想确实叙述了先民的习惯性认知故事,但上下两部分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意义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考证。考证的关键应该是作者所谓的“波浪”意象,如果能从文字和文献材料中找到足够的相应证据,则这一猜想就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云:“郑注(周礼)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证《周礼》故作昔字,后人改之。咎(昔)者古文,籀文增肉作𦉳(腊),于义为短。昔肉必经一夕,故古假昔为夕……又引申之,则假昔为昨。又引申之,则以今昔为今古矣。今古之义盛行而其本义遂废,凡久谓之昔。”^{[10]310}段氏认为“昔”是“夕”的假借字,并列多个例证。从甲骨文字形看,“昔”可能就是“夕”的意思,表示太阳已经落到水面和倒映在水中了。如果“昔”确实表达了“夕”的意义,则“昔”与“夕”的本字与借字关系可能会倒过来,或者他们之间不存在假借关系,而是同义不同象的关系。因为“昔”既符合先民创造汉字意象的认知习惯,也符合先民运用汉字构形进行生活叙事的方式。

其二,汉字意象的结构叙事是汉字字形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朴素地表达了先民习惯性根据客观事物关系创设文字结构形状的故事。关于“日”的一组字如“昧、晓、曙、朝、旦、早、昃、昏、暮、晚、盱”也能证明,汉字可以运用内部结构关系表达早中晚的不同时间段范畴,即先民积极运用字形内部结构关系参与时间段叙事。这组字大体分为左右和上下两种结构关系,左右结构的字有“昧、晓、曙、朝、晚、盱”,可以理解为早晚时候“人”与“日”的平视关系。昧,爽也,旦明也,从日未声^{[5]137}。段注:旦明也,各本“且”作“旦”,今正;且明者,将明未全明也^{[10]305}。晓,明也,从日尧声^{[5]139}。曙,形声,从日,署声^{[5]139},本义是天刚亮时。朝,甲骨文字形,从日在草中,从月^{[28]2235};字象太阳已出草中而月亮尚未隐没之形。晚,从日,免声^{[5]138};本义是傍晚、黄昏。盱,晚也,从日干声^{[5]138}。因此,这组字形的左右结构集体叙述了“人”与“日”的相对位置关系。上下结构的字有“旦、早、昃、昏、莫”,可以理解为俯视、仰视太阳时,即“人”与“日”的上下位关系。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5]140}。早,晨也,从日在甲上^{[5]137}。昃,从日,仄声^{[5]138};本义是太阳西斜。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5]138}。莫,日且冥也,日在艸中^{[5]27}。这组字形的上下结构形象地叙述了“人”与“日”的上下位置关系。汉字结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其结构叙事虽难以反映汉字的全部结构关系,但不能否定汉字

结构设计理念的存在,也不能否定先民朴素的空间意识在造字结构中的映现。

其三,传统字族叙事是由一个声符意象串起来的一组汉字用共同含有的底层意义表达涉及字词关系的故事,因为这个声符音读一般又是口语词的语音符号,是字词联系的纽带。上文讨论的“昔”声字族就集体验证了初文“昔”的底层意义的存在,其造字聚族依据是先民借用汉语特有的意近音同原则。如果上述“昔”的甲骨文确实由“水纹”和“日”两个意象构成,则明显可见“日”与“水纹”紧密相接,“日”又似在水波中上下“浮沉”,继而引申指白昼与黑夜接触交替的黄昏时间节点。“昔”声字族“厝、错、措、惜、蜡、借、藉、籍、喯、鹊”等,因为“昔”这个共同声符意象而或远或近、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接触交替”的底层意义。一方面,前五个字具有明显的接触交替意义。厝,厉石也,从厂昔声^{[5]194};《小雅·鹤鸣》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传》曰:“错古作厝,错石也,可以琢玉”^{[10]452}。错,金涂也,从金昔声^{[5]295}。措,置也,从手昔声^{[5]252}。惜,痛也,从心昔声^{[5]222}。蜡,蝇蛆也,从虫昔声^{[5]281};段玉裁认为,“礼记·郊特牲借为八蜡字,寻八蜡本当作昔”^{[10]675}。另一方面,后六个字既假借字音又借用其上述底层义。借,假也,从人昔声^{[5]165};段玉裁认为,“《尔雅音义》释‘鸟喯喯下’曰‘说文云借字也’。按云当作之,喯乃譜之或体,今许书譜下无假譜之训,岂通作借而遂删之与。闻疑载疑,孰理而董之矣。古多用藉为借,如言藉令即假令也”^{[10]378}。鹊,从佳昔,昔声也^{[5]82}。藉,帝藉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藉,从耒昔声^{[5]193}。籍,簿书也,从竹藉声^{[5]95}。藉,祭藉也;一曰艸不编,狼藉,从艸藉声^{[5]24}。字族叙事可能存在“过度概括”底层意义的风险,但仍然是汉字音形义综合研究不可或缺的分支。正如形符能够表达义类的观点,字族叙事或隐或显地表达了一群汉字意象在先后生成过程中先民的集体想象和合作创造故事。

确实,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汉字的产生和演变也形象地记录了中国先民认知世界、创造意象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和智慧。

参考文献:

- [1] 张涌泉,韩小荆,梁春胜,等.近代汉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语言学研究,2022(2).
- [2] 李运富,王立军,齐元涛,等.汉字学研究现状与展望[J].语言科学,2021(5).
- [3] 周易正义:卷第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 周礼正义:卷第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6] 扬雄.法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7] 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 [8] 陈会兵.《六书故》的“六书”理论和语言学思想[J].学术论坛,2005(6).
- [9] 李奇瑞.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对文字学的理论贡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2).
- [1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1] 王作新.汉字的表现方式与意象思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
-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3] 刘安.淮南子·本经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15]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考古学报,1972(1).

- [16] 臧克和. 结构的整体性:汉字与视知觉[J]. 语言文字应用,2006(3).
- [17] 王力. 同源字论//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8] 毛远明. 汉字源流与汉字研究的新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 [19] 沈兼士.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 白川静. 汉字的世界:上[M]. 陈强,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 [21] 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埃兹拉·庞德,赵毅衡.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J]. 诗探索,1994(3).
- [22] 刘亚斌. 庞德的意象诗学:汉字的意象性及其跨媒介效果[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6(2).
- [23] 赵元任. 论汉语和汉字[J]. 汉字文化,1994(2).
- [24] 董乃斌.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J]. 社会科学,2010(3).
- [25] 朱崇才. 汉字叙事学的研究空间及路径[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4).
- [26] 骆冬青. 论汉字的“通感”和“共通感”:汉字图象的美学创辟[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4).
- [27] 王继洪.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28]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The Image, Algorithm and Narra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s

ZHOU Bei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serve as a public image, embodying the materi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ancient ancestors. Consequently, their imagery possesses remarkable stability, with its essence remaining unchanged despite social evolution.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 specific algorithms for image formation,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 clustering. The algorithm for image form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theory of six types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The algorithm for structural composition pertains to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encompassing the procedural arrangements through which ancestors perceived and simul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objective entities to generate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conceptualization process of imageries. The algorithm for character clustering represents the categorical arrangement whereby ancestors emulated the natural principle of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come together, people with a similar mind fall into the same group” to aggregat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its typical manifestation being the character family theory. Through these algorithms, Chinese characters can narrate events related to image formation,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 clustering. Imagery narrative employs the imag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convey stories of ancestors’ cognitive processes of forming images. Structural narrative utilizes glyph structures to express stories of ancestors’ habitual creation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relations among objective entities when devising writing systems. Character family narrative primarily involves a group of characters linked by a shared phonetic image, expressing stori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words with the underlying meaning collectively convey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group.

Key words: primitive characters; structure; conceptualization; character family

[责任编辑 铁晓娜]